

※採訪報導※

聽「永遠的臺北人」 說《臺北人》、《孽子》的故事

蔣宜芳*

「面對作家」的開鑼人物

以往演講時，稍嫌空曠的二樓會議室，今天不僅擠得沒有立足之地，連空氣也變得稀薄了起來，因為，白先勇先生要來演講。

以往文哲所的文學組成員，研究對象僅限於文本，和作者沒有太多直接的接觸。今年王靖獻所長決定打破慣例，仿效近史所做現代傑出人物口述歷史的模式，為作家們做口述歷史，把作家的創作歷程、感情、精神走向記錄下來，幫助讀者閱讀、研究作家的文本。於是提出了「面對作家系列」演講的計畫，邀請傑出作家演講，讓讀者可以透過作家，瞭解作家的創作經歷、思想、情感、作品的深層意涵。

而挑選白先勇先生作為「面對作家系列」演講的開鑼人物，除了因為白先勇先生是非常傑出的作家之外，還有三個理由：第一是白先勇先生這幾年來仍然致力於創作，他的作品不僅依舊感性動人，給人的衝擊甚至更大。第二是長年旅居美國的白先勇先生，從寒假以來一直住在臺北，機不可失。第三是文哲所所長王靖獻先生是白先勇先生相識四十年的老朋友。當初白先勇先生躲在愛荷華的玉米田裏寫小說時，王靖獻先生就和他「混」在一起了，兩人都吃過 Iowa 的玉米、同在軍營裏上課，聯手為現代文學打拼，多年的患難之交，現在為朋友兩肋插刀，也是應該的。所以白先勇先生就成了「面對作家系列」演講的極佳開場人選。

* 蔣宜芳，本所約聘研究助理。

免脫多次終於落網

之前，文哲所曾多次邀請白先勇先生來演講，但是一直無法如願。因為白先勇先生覺得文哲所裏研究文學的專家環伺，在這些人面前班門弄斧，怪可怕的。加上文哲所裏的李奭學先生對自己的作品比自己還熟悉，去演講簡直是自投羅網，所以怎麼樣也不肯到文哲所演講。不過，文哲所這次祭出絕招，搬出白先勇先生相識四十年的老朋友王靖獻先生，白先生只好乖乖就範。因為他覺得老朋友進駐國家最高研究機構，當起所長來了，不賣個面子總說不過去。

但是，要講些什麼呢？讓白先勇先生傷透腦筋。深怕白先生遁走的副所長華瑋女士立刻獻題「小說創作的形成——從《臺北人》到《孽子》」，請白先勇先生講講自己的創作歷程、感想。講自己的經驗，對於白先勇先生來說並不困難，也不用看文本準備功課，所以白先勇先生便放心的「自投羅網」。

生活經驗成為創作泉源

常常有人問白先勇先生，創作泉源從哪裏來？今天他也問自己這個問題，《臺北人》的創作泉源從哪裏來？他想了想，接著講了幾件事情：

秦淮河畔鹹水鴨

抗戰勝利之後，從重慶遷回南京，我父親帶著家人到秦淮河畔的百年老店馬強興吃南京最有名、最好吃的鹹水鴨。這家店就在秦淮河上，大人們邊吃東西邊談論著秦淮河的瑣事。坐在一旁吃東西的我，就從大人們的嘴裏知道秦淮河是條很有歷史的河。

中山陵之旅

中山先生是當時很受景仰的偉人，我在桂林唸的小學就叫中山小學，校歌裏也把中山先生寫進去，那時候我覺得中山先生是個不得了的偉人。抗戰勝利後，我父親帶著家人上中山陵。那是我第一次去中山陵，感覺上好像要去朝見中山先生。當時爬了好久的階梯，才到裏面。裏面的氣氛非常莊嚴，我連話都不敢講。

玄武湖情人划船

玄武湖是南京很有名的名勝，夏天湖裏會開很多的荷花，很多人會去那裏划船。由於湖裏的荷花很多，常常一划就卡在荷花叢裏，要掙扎很久才可以把船弄出來。有很多情侶喜歡去那裏划船，我也去過那裏划船，在荷花叢裏發現一對一對的情侶，當時我才八、九歲，卻已經懂得人事，知道他們在談戀愛。

開飛機把馬子

抗戰勝利回南京之後，常常可以看到一種景象，學美國軍人戴著雷朋眼鏡的時髦空軍小子，穿著美式的翻領皮夾克，手裏挽著女孩子逛街。當時，我的一個朋友，在金陵女大讀書，人長得很漂亮，有很多時髦的空軍追她。她媽媽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教育博士，管教非常嚴格，偏偏女兒不聽話，造反交男朋友，害得她一天到晚攔堵這些人。金陵女大的校長曾經跟她抱怨，有些空軍爲了追她女兒，開著飛機在學校上空轉，她女兒還拿著手帕在那跟這些人招手。

金條名戲〈遊園驚夢〉

抗戰結束後，八年沒唱戲的梅蘭芳，重登舞臺在上海的美琪大戲院唱〈遊園驚夢〉。抗戰期間，日本人要梅蘭芳爲他們唱戲，梅蘭芳不肯，並離開上海。戰爭結束後，梅蘭芳回到上海唱戲、唱崑曲，很多人都想去聽，當時的黃牛票一張叫價一根金條。剛巧有人送票到我家，所以我就有機會去聽那場戲。當時我才十歲，卻被〈遊園驚夢〉裏的〈皂羅袍〉婉轉哀傷的旋律給迷住了，一輩子都忘不了。

銀狐香風俏佳人

我曾經見過兩個女人，她們的一舉一動給我很深刻的印象，第一位喜歡穿白旗袍，舉手投足都非常美，走路時還會飄出一陣香風。第二位是親戚的太太，她長得非常美，以前在秦淮河畔唱戲，有一次她到桂林，下了火車，當時她穿了一件銀狐大衣，手上抱了一隻白色的小狗，整座桂林城都震動了！

這些毫無關係的經歷，在十幾二十年之後成爲小說創作的泉源，被編寫進《臺北人》的故事裏，遊玄武湖變成〈一把青〉裏的情節，喜歡穿白旗袍的美女搖身一

變成顛倒眾生的尹雪艷，爬中山陵成了〈國葬〉裏的片段。秦淮河、崑曲《遊園驚夢》更成了小說〈遊園驚夢〉的要素。

白先勇先生當時根本沒有意識到這些事情、這些人對他會有什麼意義，沒想到在日後卻發生了作用。所以白先勇先生認為創作泉源究竟從何而來很難說，可能是聽了一首歌，可能是遇見一個人，可能是到某個地方等等。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一定是來自於生活中所接觸到的人、事、物。

「金陵懷古」的限題創作

至於《臺北人》這部作品究竟是怎麼形成的呢？看過《臺北人》的人都知道，這本書的主題統一，全圍繞在書裏的題詩〈烏衣巷〉上。讀者可能會認為，這是預先設計好的。其實不然，白先勇先生開始寫《臺北人》的第一篇小說〈永遠的尹雪艷〉時，雖然選了唐代詩人劉禹錫的〈烏衣巷〉作為題詩，卻對剩下的十三篇要寫什麼，沒有一點概念，而是寫一篇想一篇。不過，第一篇的題詩卻在無形中框住了他，接著寫出來的故事都離不開懷古、歷史滄桑、興亡的主題。為什麼這首詩有這麼大的影響呢？又為什麼會選這首詩呢？

對日抗戰時，白先勇先生年紀還很小，和家人住在南京，南京淪陷他跟著家人逃到重慶。一九四六年抗戰勝利，政府遷回南京，他和家人也跟著搬回南京，當時正是春暖花開的季節，大人們「漫捲詩書喜欲狂」的心情，以及社會上瀟灑的興奮氣氛，給九歲的他非常深刻的印象。可惜好景不長，一九四九年大陸失守，他和家人擠上停在南京中山碼頭的船上，準備逃到臺灣。當時是冷冽的冬天，長江滾滾，放眼望去一片蕭瑟，和一九四六年從重慶遷回南京的那種景象，差了十萬八千里，整個氣氛都不對了，他深刻的感受到什麼叫做歷史興衰。

落難到臺北之後，這個白先勇先生口中不怎麼好看的城市，給了他一個棲身之所，和他渡過了一段艱辛的歲月，箇中的滋味可以和《世說新語》裏〈新亭對泣〉的感懷相對應。或許是這段經歷，這類描寫懷古、歷史興亡的作品，對他產生很大的影響，如講東晉南遷後王公貴族、文人士子生活點滴的《世說新語》，講南明王朝傾滅時期故事的〈桃花扇〉。

而〈烏衣巷〉這首詩講的是西晉東遷、歷史興亡的滄桑，自然很容易引起他的共鳴，因為他也經歷過那種天翻地覆的遷徙——從南京到重慶，再從南京到臺北，也親眼目睹了歷史興衰，於是下意識裏選了這首詩作為《臺北人》的題詩，而這首

詩也從此左右了《臺北人》的命運。

此外，白先勇先生還提到一件事；寫〈永遠的尹雪艷〉時，他正在美國的愛荷華大學讀書，愛荷華在美國中西部，當時是個非常鄉下的地方，放眼望去就只有玉米田。在玉米田裏寫著住在臺北花花世界裏顛倒眾生的尹雪艷，不論怎麼想都覺得很滑稽。

反映現實生活的《孽子》

《孽子》是白先勇先生的代表作之一，這段時間公視每星期六晚上都會播《孽子》。很巧的是白先勇先生來的前一個星期六，剛好播放龍子和阿鳳初次見面的那一段。這本書讀者最感興趣的部分除了怎麼會寫這部小說之外，就是龍子是不是作者個人的影子？白先勇先生開心的笑著說：「很多人都這麼問我，但是，小說就是小說，如果小說家老是寫自己的事情，一定不是好的小說家。」望著滿臉疑惑的大家，他打破謎底：其實龍子和阿鳳故事的靈感是從報紙得來的。讀中學的時候，報上曾報導一個男人因為同性愛人背叛，憤而殺掉對方。他對這種激情非常感興趣，他說：「愛一個人會愛到要把對方弄死，這種熱情很可怕，也很動人，很驚心動魄。」

此外，當時社會上還有一種現象，緊緊地抓住白先勇先生的目光。那時候有很多外省老兵和本省姑娘結婚，由於文化、背景、語言都有隔閡，往往造成悲劇。他認識的一個小孩子告訴他自己的遭遇：他爸爸是外省老兵，媽媽是本省人，媽媽耳聾走路不太穩。他被爸爸趕出家門時，媽媽怕他被爸爸打死，擋在他們父子倆的中間，爸爸每打他一下，站在中間的媽媽就會摔倒在地上。白先生聽了之後，印象非常深刻，這段故事後來就成為阿青的故事，只是阿青被趕出家門之前，阿青的媽媽已經先離家了。由於這些故事的啟發，《孽子》就誕生了。

《孽子》拍成連續劇，白先勇先生看了之後有很深的感觸，他覺得電視劇裏呈現了外省人的悲傷，本省人的悲情，阿青則代表兩邊的傷痛。這些故事背後的這種意義，可能在他寫作《孽子》的時候，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所以他在寫作的時候未必有這麼深刻的想法，但是電視劇卻呈現出來了。

最後，白先勇先生還提到《孽子》裏兩個重要的主題：父子、非血緣家庭。有人曾問過白先勇先生中國人寫的同性戀小說和西方人寫的同性戀小說有什麼不同？他認為，西方人可能寫個人命運，或者寫社會對個人如何？中國人寫的則是離不開

家庭。就像《孽子》裏面所呈現的；父子之間強烈衝突，造成家庭破碎，父子關係斷絕。但是，這並不代表脫離家庭的兒子從此脫離家庭，《孽子》裏來自不同血緣家庭的孽子們，在外面拜毫無血緣關係的長輩為父親，組成非血緣的家庭，彌補了脫離血緣家庭的失落。

尾 聲

白先勇先生準備寫《臺北人》裏的名篇〈遊園驚夢〉時，正在加州的海邊小鎮 Santa Barbra 當講師。暑假期間他跑到 Berkeley，住在那裏最醜的一條街 Grant Street 的小公寓裏埋頭寫〈遊園驚夢〉。他把 Berkeley 圖書館裏《牡丹亭》、梅蘭芳的東西借回去看，邊看邊聽自己的梅蘭芳唱片，慢慢的把這個意識流的故事拼出來。初稿完成之後，帶回 Santa Barbra 修改，夏去秋來直到冬天，前前後後改了五次，喝了好幾缸的茶，才完成這篇小說。

而寫到最後一篇〈國葬〉的時候，他徹夜改稿，直到早上八點才完成。停筆之後他走到窗邊，開了窗才發覺天亮了。於是他離開每個月九十九塊租的簡陋小公寓到海邊散步，腦海裏不禁想著：我居然寫完了。心裏有一種釋放的感覺，因為寫《臺北人》的時候，柯慶明先生當編輯整天催稿，壓力很大。但是，寫完了，話也就講完了，心裏空空的，似乎失去了什麼……。

聽完白先勇先生短短兩個小時的演講，我想在場的人心裏可能也和當時的白先勇先生一樣——空空的，盼了許久的演講，終於聽到了，但也很快的結束了，雖然高興卻也有些失落。白先勇先生後來寫了《孽子》，填補了自己的失落，而我們這些讀者接著可以再讀到白先生的哪些作品，以填補這個意猶未盡的失落呢？